

王船山历史观  
与史论研究

元之亡，人多以之归咎于世宗。予不以为然。盖其时政事已坏，人情已变，其时数百年之大变，人言从者，王侯君非古之列土牧民者，又安得不以是而增之以庶。



# 王船山历史观 与史论研究

黄明同 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长沙

# **王船山历史观与史论研究**

黄明同 吕锡琛 著

责任编辑：邓谭州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90,000 印张：9.125 印数：1—1,450

统一书号：2109·62 定价：1.75元

新书目：85—22

# 序

李锦全

王船山(即王夫之)是我国十七世纪的杰出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在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是唯物主义的，并且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在发展观方面，也有相当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些都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是对他的历史观如何估价，却存在比较大的分歧。1982年在衡阳召开的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会上，就船山思想是否具有启蒙性质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双方分歧的焦点又比较集中地反映在对其社会历史观的评价上。其实这个争论由来已久，从侯外庐与熊十力的分歧算起，已长达半个世纪，至今仍未见有一致的趋势。可见王船山的历史观，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算得上是一块难以攻克的高地。

黄明同同志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有年，并着重探讨历史观方面的问题。她最近完成的《王船山历史观剖析》这一新著，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争论的集中点入手，通过对船山历史观的剖析，希望在双方交战的戈戟丛中，觅出一条新路。当然，这个目的能不能达到，不能只看主观意图，更主要是看客观效果，看其著作是否具有科学性。

作者认为，王船山生活在明清之际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

历史转折时期，当时社会上存在着方生未死、“死的拖住活的”的矛盾。如同过渡阶段上事物往往具有二重性一样，反映这样一个转折时期的船山哲学，也具有这种特点。据此，作者认为不应以“非此即彼”，而应以“亦此亦彼”的观点来看待船山哲学。船山的历史观是一个包含着很大矛盾性的体系，其中有较多的唯物主义因素，闪烁着耀眼的理论光华；但它终究还是唯心史观。作者力图避免过去学术界那种或因肯定其唯物主义因素而拔高，或因只看其局限性而贬低的片面性，把其贡献与局限联系起来，从整体上作全面的考察，并力图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探寻其由贡献走向失足的主客观原因，从而对船山的历史观作出了比较公允的评价。

为了更好地分析船山历史观的实质，作者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作者指出，明末清初资本主义已经萌芽，新的生产关系已经产生。船山在历史观上不自觉地反映了这种新时代、新阶级的要求。他重视人，以人为历史观体系的出发和归宿；他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的统一，是声色臭味与仁义礼智的统一，这就使在当时看来是神圣的封建道德与罪恶的人欲具有同等价值。船山以其理欲合一论批判宋明理学家的存理去欲论，是十分可贵的。由于他强调人是自觉的、有道德的、有作为的动物，其历史观实质上已提出了“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思想。

由此出发，王船山提出历史进化论和一治一乱论。他否定历史倒退论，批判和改造了传统的历史循环论。他把历史描写为一条不断向上延伸的曲线，从而看到了历史发展中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这就接触到了历史发展中的部分质

变问题。

王船山十分强调历史发展自身的必然性，他的理势合一论，揭示出历史要受客观规律的支配，否定唯圣人意志可以左右历史的观点。但他也注意到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不同，在强调规律的客观性，不可抗拒性的同时，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必须通过人（即“假手”）的自觉的有目的活动方可表现。船山的这个“假手”论，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揭示人与规律的关系。由于船山在天人关系上，即在社会的主体的人与客体的天（自然）的关系上，作出了比较合理的回答，因而避免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并具有深远影响的自然宿命论和道德决定论两种错误倾向。船山对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的能动精神间的辩证关系的深刻揭示，是其历史观的主要的、突出的贡献。

作者对船山的历史观虽然作了较高的评价，但同时也指出其深刻的内在矛盾和致命的弱点。例如，作者认为在天人关系上，船山没有彻底突破传统的思想的束缚，把天人关系看成是体用的关系，从而把人的一切道德行为看作是天理之显现流行。又如船山提出的心为桥论，把心说成是天人之桥，是社会主体与客体相联系的纽带。作者认为，这是船山在肯定理势的客观性和不可违抗性的同时，又力图维护心的至上性，并力图把二者糅合起来，显示出其二重色调，从而构成船山历史观的特点。船山这种心与理势相糅合的理论，反映他已猜测到人们把握规律创造历史的过程，是一个包括从客观到主观，又从主观到客观的过程。这种思想当然是很可贵的。但船山找不到社会发展规律是如何转化为人的主观意志、

决心和作为的途径，于是只好把理说成是人心所固有。这样，在船山的历史观中便出现了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强调理是社会自身固有的、不可违抗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认为理是先验地寓于人心之中，为人心所固有。这种混乱和自相矛盾，终于导致夸大心的作用，夸大圣人的作用，最后滑入唯心史观。

由于船山把心作为天人之桥，就必然要想办法维系此心而不失。他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抓住纲纪、伦理。而能够秉礼、挈纲、循理的又只有圣贤明君，故其历史观最后达到了尊君的归宿。作者认为，船山尊君，但不是绝对君权论者。他反对天下过多地集权于天子，主张分级而治，表现了中小地主要求权力再分配的政治愿望。同时他鉴于历史与现实的教训，特别是亲身经历过农民革命的风暴，所以多少也看到人民的力量。但由于他的阶级偏见，却又轻视劳动群众。他主张圣人见天于心，并把他们神化为具有先验真理的先知先觉者。这一切又使他始终不能找到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最后不得不走向唯心主义英雄史观。

作者指出，船山在历史观上的局限，并不是偶然产生的，其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出现大机器工业生产，资本主义嫩芽幼而未壮，封建制度垂而不死。时代还没有为他提供整个地突破传统历史观的条件。加之船山本人的出身、教养和社会实践，决定了他基本上还是一位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船山毕生从事对传统思想的整理和改造，所以他毕竟只能做到“六经责我开生面”，而不能从传统的旧壳中脱胎而出。然而也要看到，船山生活在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复杂的年代，走

过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经历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时代给他提供的条件是极其艰难困苦的，但他却以极其敏锐的识力和顽强的创造精神，作出了超人的贡献，使其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中国古代向近代启蒙哲学的过渡环节。

据此，作者对学术界讨论船山是理学家还是启蒙思想家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船山是批判地总结了理学，是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其朴素唯物论已达到了古代哲学的最高水平，但还不是近代哲学的起点。因此，不宜称船山为理学家，也不应称之为反理学家，更不必在是否为启蒙思想家的问题上兜圈子。应该看到，船山哲学思想的矛盾属性，正是过渡阶段中事物亦此亦彼的特点。明同同志这种观点，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从实际史料出发，通过对船山的历史观作全面系统的分析，进而揭示其内在的逻辑联系之后得出的。因此，我认为它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总的来说，明同同志对船山历史观的逻辑路径，确实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当然，象船山那样一个博学多识而其哲学体系又充满着内在矛盾的思想家，其历史观的时代特点及其内在的逻辑发展层次，每一个研究者都可以有不同的解剖方式，并且可以从不同角度留下深入钻研的余地。明同同志所作的论述，只是表达她个人的见解，希冀由此而引起学术界对船山历史观作进一步的探索。

明同同志好学深思。由于我与她是在同一地区工作，又是中哲史学科的同行，所以近年来在学术研究中，颇收到相互切磋之益。最近，她又拿出《王船山历史观剖析》这部专著的稿子给我看，我看后感到由衷地高兴，愿意为她的专著

作点介绍。当然，上面我所说的一些话，不一定准确，只是想为读者在阅读这部专著时提供一点方便，如有不当的地方，应由我本人负责。至于这部专著中的论述，读者如果发现舛错而提出意见，估计明同志是会欢迎的。学问没有止境，只有永不自满的人才能不断求得进步。我愿意以这种精神，与明同志共勉。

# 序

陶懋炳

锡琛和黄明同先生合撰的《王船山历史观与史论研究》(锡琛专写史论部分)一书即将问世，我于欣慰之余，信笔写上几句。

十七世纪伟大的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家王船山，对我国古代史学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集中表现于他的史论上。船山的史论，体现了他渊博的经史之学，更体现了他精湛的史学思想，是我国古代史学的瑰丽珍宝之一。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范文澜、稽文甫、侯外庐诸前辈探讨船山学术思想，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解放后，继起者日增，成果累累。然而，绝大多数是对船山的哲学思想进行论述，而对船山史学的探讨，则尚感不足。虽然稽老曾在这方面有所撰述，提出了某些具有启发性的见解，但可惜未遑深入，并且这是一家之言，尚需开展深入的讨论。近年来，史学界也有人评述船山史论，而捧读后似感创获尚渺。因之，研讨船山史论，还是史学界的一项重要课题，需要我们继续艰苦深入地进行探索。锡琛是位青年史学工作者，自然还不能企及前辈，不过，我看了她的尝试之作，觉得颇有新意。

她从船山的经世致用的治史目的入手，一开始就扼要地将中西学术文化发展的不同历史状况加以对比，再纵论我国古代经世致用之学的渊源和其迂回起伏地发展的概貌，着重地论述了十七世纪的形势和思潮。这样，就能比较适当地给予船山学术思想以合理的历史地位。然后，系统地探讨船山史论的几个方面，由经世致用引出其政治、经济思想，继而论述其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最后伸展至鉴史的辩证观点，前后层次分明，联系紧密，逐步展开论证。可贵的是，作者通过有关论证，把船山的爱国主义、进化论、辩证法以及反对极端封建专制主义的早期民主思想烘托出来，给读者以清晰而深刻的印象。在评述船山史论的过程中，作者不但以信而有征的史料为根据，言之确凿，而且揭示了船山立论在当时的针对性，阐发了其中的微言大义。作者把船山史学思想和前人联系、对照，探其源流，指出其创新之处，又与同一时代的杰出思想家比较，使能互见得失。

作者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进而对当前“船山学”研究中的几个争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当然不能说完全确切，但她这样做表现了史学界新秀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值得欢迎的。

锡琛在短短四、五年之中，写出了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著作，确非易事，这中间凝结了她多少的心血和汗水！回忆她踏入大学门的时候，虽然“四人帮”被粉碎已有一年多，但“左”的影响还存在，学校的课程、教材和师资问题，还没有妥善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缺乏高度的上进心和坚毅的意志，那么，她是不可能于听课之外，坚持自学，广求

教益，从而有今天的成就的。她在大学毕业以后，勤奋倍于往昔，夜以继日地钻研“船山学”，把事业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问题放在第二位。我对她的这种精神，知之深，感受也深，虽欲为国培育英才，而自惭谫陋，常有力不从心之叹。她写的这一论著，一方面是雏凤初鸣，已呈清音；另一方面，也会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足、甚至舛谬之处。然而可以断言，国内前辈学者不仅不会以此嗤之，相反地都会爱护这棵正在茁壮成长的幼树，多方加以培育，使之更迅速、更茁壮地成长。

我为锡琛的成就而感到欣慰。然而，这只是她治学迈开的第一步，我殷切地希望她继续努力，循着崎岖险峻的路径而攀登科学高峰，为中华妇女争光，为建设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贡献。

# 目 录

序	李锦全	(1)
序	陶懋炳	(1)

## 上编 王船山历史观剖析

第一章 贡献		(1)
第一节 人的本质		(1)
第二节 进化与一治一乱		(10)
第三节 理势合一		(29)
第四节 理势与假手		(40)
第二章 矛盾		(49)
第一节 心为桥		(49)
第二节 伦理为纲		(71)
第三节 道统、治统与尊君		(85)
第四节 内在矛盾		(97)
第三章 归宿		(108)
第一节 路径与归宿		(108)
第二节 时代与阶级的局限		(110)
第三节 终结与过渡		(121)

## 下编 王船山史论探索

第一章 治史的主要目的		(135)
第一节 经世致用		(135)

第二节 防民恤民	(144)
第三节 剖析弊政	(158)
第四节 力振士风	(169)
<b>第二章 论史的是非原则</b>	<b>(185)</b>
第一节 “大公至正”	(185)
第二节 上下相谐	(196)
第三节 民族至上	(210)
<b>第三章 鉴史的辩证方法</b>	<b>(227)</b>
第一节 “推其所由”	(227)
第二节 “变通可久”	(239)
第三节 “不敢执一”	(251)
第四节 “利在害兴”	(266)
<b>后记</b>	<b>(274)</b>

## 第一章

### 贡献

社会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总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对于社会的本质及其最一般规律的回答。王船山在其主要哲学著作《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诗广传》、《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及其史论专著《读通鉴论》、《宋论》等书中，继承传统历史观的优秀思想成果，并作了某些创造性的发展，从而形成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完整的历史观体系，比前人更高明地回答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王船山的历史观，是其具体的史论观点的理论升华。以下，我们将扣住王船山社会历史观的一连串问题，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剖析。

#### 第一节 人的本质

王船山的历史观，以人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其理论体系，从研究人的本质开始，以揭示人的能动精神，特别是“圣人”的作用而告终。

社会历史，是由无数的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所构成。离开了人和人的活动，就无所谓社会和历史的存在。人，是社会的主体。因而，以探究社会本质及其规律为目的的社会历史观，不能不研究人。当然，研究人的学科，并不限于哲学的历史观。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从一开始便注重对人的研究，王船山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从论述人的本质开始，建立其历史观的理论大厦。

王船山认为，人既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

首先，王船山从其唯物主义的气一元论出发去考察人，提出“人继天而生”，“唯天生人”的论点。

天是什么？王船山对“天”作过多种规定。

在“人继天而生”、“唯天生人”中的“天”，指的是作为世界本原的太虚之气。他说：

“太虚即气，𬘡缊之本体，阴阳合于太和，虽其实气也，而未可名之为气；其升降飞扬，莫之为而为万物之资始者，于此言之则谓之天。”<sup>①</sup>

“天无体，太和𬘡缊之气，为万物所资始，屈伸变化，无迹而不可测，万物之神所资也。”<sup>②</sup>

王船山认为，天是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物质“本体”。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天不再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天之生人，并非神的有意志有目的的创造，而是物质性的气的内在的矛盾运动。这样，王船山便否定了人是神的创造物这一传统的宗教

---

① 《张子正蒙注》，中华书局1975年版（下同），第17页。

② 同上书，第34页。

迷信观点。

天如何生人？人为何是“天而生”？王船山以为，因为气中包含着阴与阳的矛盾，“阴阳具于太虚𬘡缊之中”，<sup>①</sup>“二气之动，交感而生，凝滞而成物我之万象”<sup>②</sup>。“阴感于阳而形乃成，阳感于阴而象乃著”<sup>③</sup>，“阴阳相感聚而生人物”<sup>④</sup>。人，同天地间的形形色色的种类繁多的有象之物一样，同是由气的屈伸、凝聚而成。人，同样是在阴阳二气相摩相荡、相互交感中产生的，即所谓：

“人者，阴阳合德之神所聚。”<sup>⑤</sup>

人与万物统一于气，“天地人物之气，其原一也。”<sup>⑥</sup>显然，王船山继承了自王充以来的唯物主义气一元论观点，把人首先看作自然的人，是大自然的一个部分，即物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是气凝之物。从这点上说，人与物无异。“天之生物也与其生人也，均之乎生；天之育物也与其育人也，均之乎育；故物之待生待育于天之化，亦犹之人也。”<sup>⑦</sup>天生物育物，犹如生人育人；反之，天生人育人，也就如同生物育物一样。人，无异于自然界的其他动物，都是活生生的机体，饥食渴饮方可生存。因而，为生存而产生的声色、臭味、饮食、男

---

① 《张子正蒙注》第17页。

② 同上书，第24页。

③ 同上书，第13页。

④ 同上书，第18页。

⑤ 同上书，第330页。

⑥ 同上书，第291页。

⑦ 《尚书引义》，中华书局1976年版（下同），第112页。